

泰戈尔在清华

——1924年泰戈尔在清华活动考证

○ 金富军

泰戈尔 (Rabindranath Tagore, 1861~1941), 印度伟大的诗人、文学家、艺术家,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。他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 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。他的《吉檀迦利》及其他作品如《飞鸟集》、《新月集》等深为我们所熟知和喜爱。1924年, 泰戈尔首次访华,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他的这次访华与此前罗素、杜威等人的访华一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大事。

泰戈尔于1924年4月12日到达中国, 在为期49天的访华旅行中, 钟灵毓秀的清华园成为他重要的一站。

访华前清华师生对泰戈尔的介绍

在泰戈尔到达前, 清华便开始了宣传工作。1917年《清华周刊》第106、110、111期刊登了《印度诗人塔果尔传TAGORE》, 这是国内较早较为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。此文从“幼年时期”、“办学时期”及“学说”三个方面介绍了诗人的生平、事业与思想。1918年夏, 《清华周刊》一篇文章高度评价了泰戈尔的文

学, 称赞其著作“对于祖国, 适足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, 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苦。对于世界, 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, 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。”1919年6月, 《清华周刊》第5次临时增刊又发表了吴景超翻译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《小主人》。

1923年, 泰戈尔访华的消息传开以后, 清华同学以“望穿眼”来表达其欲一睹哲师风采的心情。为了使师生更好地了解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, 《清华周刊》特意约请毕树棠先生撰文《太戈尔研究指南》, “将近几年来中西书报上关于太戈尔的论著, 作一个选择的编纂和简单的介绍, 以为读者研究太戈尔的学说与文艺之助”。

《指南》收集了从1913年至1923年十年间国内主要期刊上有关泰戈尔传记、戏剧、诗歌等的介绍、评论等文章74篇。同时收录了此一时期发表的83篇相关英文论文的索引, 这可以说是当时国内最为全面的泰戈尔论著目录。

此外, 截至1924年泰戈尔来访时, 清华图书馆已收藏泰氏英文著作25种。泰戈尔的英文



1924年泰戈尔访问清华, 第一排从左往右依次为王文显、张歆海、徐志摩、张彭春, 第二排为辜鸿铭与泰戈尔

著作，清华“图书馆已备者，虽不完全，亦不大缺”。

泰戈尔在清华

1924年4月12日，泰戈尔到达上海，赴杭州、南京、济南等地后，于23日下午到达北京，29日下午与徐志摩等同赴清华，实际停留了6夜5天。泰戈尔访问清华并做长时间驻留，与梁启超等人的热情邀请有关。从1914年起，梁启超便不时在清华从事著述或讲学，与清华师生“感情既深且厚”，“觉无限愉快”。他所开“最近三百年学术史”与“群书概要”等课，受到清华同学的热力欢迎。泰戈尔访华之际，清华已经成为梁启超主要活动地点之一。正是梁启超及清华校方的热情邀请与接待，才有泰戈尔在清华园长达近一周的驻留。

作为泰戈尔来华主要邀请人与接待人之一，梁启超对泰戈尔在华行程安排十分用心。1924年3月7日，梁启超致信蹇季常，商讨泰戈尔访华住所问题。梁启超指出：“独太戈尔房须别觅，真是一问题，渠不过一个月后便来，非赶紧设法不可。我想城里找适当的很难，最好是海淀，其次则香山……”并特别提出要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帮忙料理。

清华僻居郊区，环境幽静，生活设施齐全先进，吴宓称之为“世外桃源”。杜威、罗素均曾造访清华，并留下美好印象。罗素回忆：“清华大学位于西山之麓，有不少精美而牢固的美式建筑……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，比如清洁、守时和高效。我在清华的时间不长，对它的教学无从评价。但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，都让我感到完美。”

泰戈尔访华日程很紧张，泰戈尔中国之行的主要陪同人、翻译徐志摩担心泰戈尔的身体，不得不推辞了一些应酬。而清华之行，恰好为泰戈尔提供了一次休息的机会。泰戈尔下榻清华工字厅，受到了细致周到的接待。徐志摩说：“泰氏在清华住的那几天——五月初那星期，承清华学校曹云祥与张仲述两先生的好意，替他安排得又舒服又安闲，他在忙碌的旅行期内总算受用了几天的清福，那是他近年来不常有的。”

4月30日休息一天后，5月1日晚，泰戈尔为清华师生做了演讲。作为泰戈尔当晚演讲预备，下午3点至5点，梁启超做了中印文化关系的演

讲。梁启超回顾了古代中印文化交流，介绍古代印度在音乐、建筑等方面对中国的巨大影响。梁启超毫不吝惜溢美之辞，称赞泰戈尔为“马鸣菩萨”，“我盼望他这回访问中国所发生的影响，不在鸠摩罗什和真谛之下。”泰戈尔对梁启超的此次演讲非常欣赏，请梁启超将此次演讲及此前他在北师大的演讲译为英文，以便携带回国。

晚8点半，泰戈尔在大礼堂发表演说，徐志摩翻译，诗人凭自己敏捷的才思、真挚的情感，让清华师生大饱耳福。演讲中，泰戈尔呼吁清华同学要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，“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，等着她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。这是你们的责任，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。”他劝清华同学要坚持生活的美的原则，不要被物质主义的毒素玷污了纯洁的灵魂。希望清华同学“努力去建设一个世界的文化。”

泰戈尔表示，他到中国“如归故乡，至为愉快……华人审美之观念极深，虽极微细之物，均含有美术，是以多处均感其美。非如科学发达之欧美，到处均觉其丑者所可比也”。

泰戈尔在清华仍坚持批判物质文明，但语气相对此前历次演讲，已大为缓和，并且多了一份惆怅。他伤感地说：“我是倦了，我年纪也大了，我也许再也不能会见你们了，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集会。因此我竭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，不要惶惑。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……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，你们一切的工作，一切的行动，都应得折中于那惟一的标准。”这个变化与此间社会上出现的批评不无关系。为此，胡适曾创作《回向》一诗，并写成横幅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泰戈尔，借此安慰诗人，“我们要对许多人说话，就无法避免一部分人的无心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。‘尽人而悦之’，是不可能的。”

5月2日，有“中国的太古尔”之称的辜鸿铭专程从城里赶到清华会见泰戈尔。有研究者认为，梁漱溟也曾赴清华园与泰戈尔晤谈。其实不然，梁漱溟与泰戈尔讨论儒教问题是在泰戈尔即将离华之时，不可能是在清华园。

3日晚，学生会开大会欢迎泰戈尔。当泰戈尔步入大礼堂时，全体同学起立致敬。唱校歌毕，冀朝鼎代表全体同学致欢迎辞，“意气壮巍，道东方之文献；情意虔恳，言欢迎之热

诚”。会上，同学们还表演哑剧、国乐、昆曲等节目。泰戈尔对中国的国乐表现出浓厚兴趣，一曲完毕后，意犹未尽，请同学们再弹奏一曲。

在清华期间，泰戈尔还接受了同学的采访。同学们“不独争欲觐其风采，且以能与彼接谈为快”。不但领略了泰戈尔的诗哲风采，还就“西洋文明迫成之饥窘问题，应常何样解决”、“他所信仰的上帝究竟是否与耶稣教的上帝有分别”、“对基督教中所谓罪恶(sin)有何理解”等社会、人生问题，与泰戈尔进行了交流。

清华之行，不但让年老疲惫的泰戈尔得到良好的休息，与清华师生宽松自由的交流，也使诗人精神极为愉快。徐志摩说泰戈尔与学生们“谈论人生问题——自宗教至性恋，自性恋至财政，不仅听着的人实惠，讲的人不受形式拘束，也着实地愉快”，“听老人的口气似乎他自己以为与学生们的谈话是很投机的”。

泰戈尔的清华之行留下了什么？

梁漱溟评价泰戈尔“是位虚怀若谷的诗哲，对学问十分认真，关切中国问题，又如此不耻下问，不为自己的名望所累，是很难得的”。

泰戈尔的清华之行，给清华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“吾人居此霭祥可爱之乐国，得聆此诗哲环琦之高论，不禁心旷神怡，觉天下事无事不乐，天下物无物不美矣”。同学们反映“太氏温蔼可亲，且善为青年劝导”，“他带了一份极珍贵的礼物来送给我们享用。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就是他那伟大的人格。”英文教授王文显形容泰戈尔“其状高髯，其发灰白，其体从容而尊严，其音和平而甜美，其举动不用矫揉造作”。历史教授陆懋德则认为“泰氏实有一种感人之态度。令人一见而知性情之冲淡，胸怀之坦白，心地之光明，人格之高尚”。

泰戈尔在华多次演讲，宣扬其推崇的东方文明、批评西方的物质文明，引起诸多争议，社会上批评之声不绝于耳。在批评派与推崇派激烈冲突中，清华教师陆懋德的评论，显得颇为理性平和。

陆氏指出，社会上对泰戈尔的许多误解来源于对他身份认识的不当。泰戈尔自述“彼非哲学家，亦非宗教家，亦非政治家，不过诗人而已”，应让他回归诗人本色。如果“视之如大哲学家，如大圣人，而就之以解决道德政治各种问



1924年泰戈尔在清华后工字厅，左起：张彭春、徐志摩、张歆海、泰戈尔、曹云祥、辜鸿铭、王文显

题”，不但对诗人极大的误解，也会引起诗人的“不耐烦”。针对国内欢迎派与批评派言论，陆氏指出，二者对泰氏思想均有误解：欢迎派误将泰氏与甘地等同，欢迎派误解泰戈尔，而批评派因为欢迎派迁怒于泰戈尔。反对派批评泰戈尔反对物质文明，实际上，“泰氏亦非劝人绝对的不用物质文明，不过指出物质文明之弱点，使人知物质文明之外，尚有精神文明之重要而已。”反对派偏于一面攻击泰戈尔。在当时社会上两派争得不亦乐乎之际，陆懋德这种着重于分析的理性声音，显得非常可贵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5月2日，辜鸿铭赶赴清华与泰戈尔晤谈，会谈是礼节性的。对泰戈尔的思想，辜鸿铭有所保留。第二天，在接受清华学生梁朝威采访时，辜鸿铭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，他将泰戈尔比作中国的老子，认为其思想陈义甚高，足以代表印度文化，但对中国缺乏了解，因此泰戈尔所言不足以救中国弊端。如果说这次谈话辜鸿铭对泰戈尔还比较客气的话，那么在7月份的一篇文章中，从文章写作到对待东、西方文明的态度等方面，辜鸿铭对泰戈尔提出了严厉的直言不讳的批评。因此，辜鸿铭对泰戈尔的欢迎，更多地出于礼仪，而非文化认同。

泰戈尔回国后，1925年在加尔各答将在华演讲结集出版，题为《在中国的谈话》，其中第三部分“与学生的谈话”主要是他在清华的讲演，反映出诗人对美丽的清华园、对热情好客的清华师生深刻的印象。清华园之行，也成为这次中印文化交流中浓重的一笔。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研究人员）